

(上接第1版《书写新时代的“创业史”》)

历史的磅礴运动正在改变和塑造着社会与生活,准确把握时代发展的大势,对每一位中国作家都是一个根本的考验。当下整个中国正在进行的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就是一场改变中国乡村面貌的伟大社会实践,对中国、对全人类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将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消除极端贫困、让所有人的生活达到基本标准的减贫目标。2020年,这个年份将永载史册,《诗经》里说,“民亦劳止,汜可小康”,在我们这个古老的农耕文明社会,被渴盼了几千年的梦想将在这一年实现。古今中外,没有哪一次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为目的的国家行动,有如此之大的规模、涉及如此之广的群体、取得如此之多的卓越成果,中国的成功实践为人类消除贫困的艰巨斗争贡献了宝贵的智慧和经验。

这几年,我也去过一些乡村,去年去了内蒙古和新疆的农村,也去了湖南的十八洞村,我的感受固然是匆忙的,但也是深刻的、震撼性的。这些乡村召唤着我们的乡愁,从经验和情感上让我们意识到与祖先、与传统的深刻联系,但同时,在村子里,在正在脱贫攻坚而战斗的村民和干部中间,我强烈地感受到他们的辛劳和自豪、他们的向心力和向往,中国大地上无数个这样的村庄是面向未来的,正在向着新的历史前景展开着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的创造。作为作家,我们应该认识到,我们所面对的,是变革中的、内涵丰富且外延广袤的新时代的乡村世界。无论从人员的流动、经济结构的转型去分析,还是从观念意识的变化、生活风尚的更新来观察,一种新的乡村,在我们过去的历史和想象中从未有过的乡村,正在这个时代形成和崛起。

塑造新时代的新人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才能真正解决“我是谁”的问题。作家在深入生活的过程中,通过参与人民群众创造新生活的实践,获得对自我与世界的新的认识,从理性和情感上认同人民的事业,从而完成自我的锻造、主体的重塑。这样的作家,深刻地扎根于人民创造历史的进程之中,就能从历史发展的大势、从民族复兴的大局看待现实和未来,就会对我们的事业充满信心,而不会仅仅盯着某个局部、盯着暂时的困难,陷入消极悲观的情绪;就能敏感于时代的大潮,对社会进步与发展满怀热情,而不会自我隔绝,满足于同行之间的互相唱和、满足于小圈子的内循环。这样的作家,就会把个人的命运同祖国的命运、人民的命运紧紧联系起来,把民族的复兴、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安居乐业作为自己奋斗终生的目标。

只有当作家在历史的洪流中成长成为强健的主体,他才能够真正地写好“新人”。马克思说,“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的伟大斗争正在亿万民众中创造着无数新的英雄人物,书写、塑造这样的“新人”是新时代中国文学的光荣使命。

文学创作归根结底落在人。这样的“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又是充分精神化、价值化的,能够成为时代和人格化的人格形象。习近平总书记说:“典型人物所达到的高度,就是艺术作品的高度,也是时代的艺术高度。只有创作出典型人物,艺术作品才能有吸引力、感染力、生命力。”塑造典型,书写“新人”,就是要在人物身上挖掘出历史前进的总体脉络与内在必然,呈现出新时代的精神特质与精神高度。柳青曾说,“《创业史》这部小说要向读者回答的是:中国农村为什么要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这个“回答”,柳青不是凭空论述出来的,而是通过梁生宝这个活生生的新人形象,呈现给一代代读者。《创业史》问世二十多年后,同样是在陕西农村的土地上,我们又看到了路遥笔下的孙少安、孙少平。改革开放的历史大潮、城乡结构的深刻变革、昂扬奋进的时代精神,从孙少安、孙少平的形象中,得到了有力的浓缩与展现。这样的“新人”形象,扎根在生活的土壤之中,承载着作者对时代和历史的理解与洞察。这些“新人”们,无时无刻不在与自己的时代对话、彼此建构,他们在展开自己故事的同时,也传达着一代人的信念和梦想,呈现着时代的形象与意义、勾勒出历史的逻辑和前景。与此相应的,为了成功地书写、塑造出这样的新人形象,我们的艺术观念、艺术方法,也需要大胆创新。新的时代内容需要新的形式,如何为新时代的乡村现实、为无数“新人”的人生寻找“适配”的表达,这是每一位乡村题材作品的写作者都应认真思考、不懈探索的课题。

当我们谈论“乡村”的时候,其实远远不止是在谈论乡村本身。新时代的中国乡村,意味着乡土中国的现代转型,意味着如潮不息的城乡互动,折射出中国与世界的广泛联系,指向历史与未来的生成和运动。书写乡村,归根到底,就是写我们命运与共的伟大祖国,就是写我们生逢其时的伟大时代,就是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梦想。此时此刻,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真切地感受到时代的巨大变化,都能够强烈地体会到新时代磅礴澎湃的精神气象,恢弘壮阔的历史前景正在我们眼前展开,在祖国大地上,已经发生、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一切,远远超出了我们已有的文学经验,为文学创作敞开着天高地阔的无限可能。我坚信,在这激动人心的历史进程中,广大中国作家一定能够与人民同心,与时代同行,书写一部部新时代的“创业史”,登上风光无限的新高峰。

(上接第1版《各地作协积极推动新时代乡村题材文学创作》)要继承山西文学长久以来的现实主义优良传统,在坚持深入现场、直面历史、反映生活的同时,更要在创作中努力穿透现实生活的表象,真正触摸到新时代中国人民的情感世界、心灵图景和精神信念,艺术地诠释新时代语境下的新农村,努力创作出不负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

植根本地脱贫攻坚实践,塑造时代新人,创作更多优秀作品

广东作协15日下午举行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会议,主题是聚焦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引导广东文学界积极反映新时代以来中国乡村发生的巨大变化。广东作协党组书记张培忠等近40人参加会议。大家认为,繁荣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不仅是文学自身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农村现实和人民群众的迫切需要。因此,要坚持正确导向和创作导向,描绘新时代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绚丽画卷,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把握题材新优势,结合改革发展主题展现本省农村新风貌。会议号召本省作家继续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充分认识和表现当下广东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讲好新时代乡村故事,着力塑造新时代新乡村的新农民形象,展示新时代乡村建设广东经验。广东作协还印发了《关于加强全省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的通知》,推动各项工作举措落实落地。

河北作协以视频会议形式组织召开脱贫攻坚主题文学创作座谈会。省作协主席关仁山、党组书记王凤等参加会议。与会作家、评论家围绕“推进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主题创作”谈了各自的体会。大家认为,认知新时代,首先要弄懂新时代的特征,新时代、新起色、新作为。认知新事物时,要细致考量心灵、道德和文化层面的东西。作家在塑造新时代农民的时候,只有真正走近人物原型,走进他们的内心,看到其灵魂,才能把人物塑造得立体丰满,迎风而立。每一位立志于乡土文学创作的写作者必须耐得住寂寞,潜心磨砺自己的艺术功力,也要了解并掌握新知识,用心去体察新生活。新时代、新农村的书写和记录,作家不能缺席。只有重新审视自己对农村、对时代的认知,不断提升艺术创作能力和认识新鲜事物尤其是新时代中国农村经验的能力,不断创造出更多展现时代精神的乡村“新人”形象,努力讲好新时代的中国乡村故事。

来自国家温度的感动

□蒋巍

在陕西榆林,有一位年近七旬的张雷威,从50多岁开始下乡扶贫,一直干到现在,腿摔断了继续干,各县老百姓都叫他“扶贫官”,这是天下唯一由老百姓赋予的“官称”。在新疆,每个干部车后备箱都放着一卷行李,每周必须到老乡家住一至两晚,通过少数民族语言翻译和手机语音普通话的方式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爱国爱党。在墨平县的超大夜市,灯火辉煌、人山人海,生活气氛和谐。一位维吾尔族大师傅戴着大围裙,上面绣着一面鲜红国旗,我问谁绣的,他说是老婆绣的。在贵州铜仁大山里,一位老兵在自卫反击战中救回三位战友,自己却失去两条小腿,他的包里天天装着当年的战友花名册,靠假肢下乡扶贫转战八个村,后来卖了自己的房子种植数千亩茶园,安排当地乡亲就业。访谈时他突然把假肢“碎”的一声甩到墙角,大叫:“我现在能上能下,怕什么!”那一刻我泪流满面。他的手机声就是军号声,因为他,我把自己的手机铃声也改成了军号声。在上海,一位年轻博士到西藏支教,把一所九年制中学办成全藏最优秀的学校;在黑龙江,因地病穷困了数十年的“傻子屯”经过两代村支书努力和驻村工作队的帮助,变成富裕村,出了70名大学生、3名硕士、3名博士。在脱贫攻坚战进入最关键的时刻,新冠疫情又突袭而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亲自指挥,举国上下

闻风而动,两面作战,以世界上最快的速度遏止了疫情蔓延。无论西方政客怎样抹黑甩锅,中国大局稳如泰山,复工复产全面展开,扶贫攻坚气势如虹坚定推进,这是任何人无法否定的事实。

这就是我这次扶贫采访中看到的一切,每个人物每个细节都让我无比感动,而且让我深深欣慰和骄傲的是,许多人物是我从大山深处捞出来的,如果没有主动发现,他们也许始终默默无闻。这就是作家的使命和职责体现,让那些默默无闻的时代英雄被看见。

从去年9月接受作协分派的任务到今年6月,10个月我辗转五省七地(陕西榆林,新疆乌鲁木齐,和田,贵州铜仁,上海,黑龙江省佳木斯、哈尔滨),总行程相当于绕全国一圈,创作成果是长篇报告文学《国家温度——2019-2020我的田野调查》,现已交作家出版社编辑出版。过后我从哈尔滨直飞贵州,开始了另一部扶贫作品的创作,暂定名《主战场》,说实话我已经两年没回北京的家了,八过家门而不入也有了。家里堆满了书和行李,像一个仓库。太太身体不好,收拾不动,躲到上海女儿家了。我一直在路上,每到一地翻山越岭,然后在孤独的宾馆房间,打开孤独的大脑,伴着孤独的台灯,重新采访录音,有时泪流满面,有时哈哈大笑,经常一整天没有人说话,这就是我一年

甚至多年来的日常。习近平总书记号召作家艺术家要加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如今73岁的我必须再加一力——体力。我经常一梦醒来,还误以为自己是18岁或28岁的青年,欣欣然策马出征。

什么是我的动力?我的激情从哪里来?我虽然没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睿智,但从北大荒下乡之日起,我就有了和人民同忧同乐的情怀。这不是假话,是心里话。看到人们的苦难和眼泪,你怎么能不悲伤呢?看到国家的兴旺与发达,你怎么能不骄傲呢?看到一个个风雨飘摇、垃圾遍地的村庄变成了美丽乡村、风情小镇,你怎么能不感动和欣慰呢?这不需要觉悟,这是最普通的良知和情感,是生命该有的温度。一个作家,怎么可以冷冰冰地活着呢?你不能认为只有自己案头的台灯是最亮的,台灯之外三米远的地方都是灰暗的。现在中国所有村庄都亮起了太阳能路灯,它们比作家的台灯亮得太多了!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国掀起的扶贫攻坚战,在世界文明史上无前例,人力物力财力投入之巨史无前例。数千万贫困农民解决了“两不愁、三保障”问题,一千万人从“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的大山深处搬进城镇新区,一夜之间从农民变市民,而且“一个不落”。当党和政府不仅为我们预备了床、沙发、桌子,连第一顿菜肉都摆



在厨房里了。当然,他们也有“快乐的烦恼”,不会开防盗门,进超市不会刷手机,晚上遛弯找不到新家。于是中国开办了世界上最大的“特训班”,教村民们学会新时代的新生活。脱贫攻坚、同步小康,事实上是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和文明跃升,它的意义怎样估计都不为过,它将深刻影响中国的未来。脱贫攻坚也使得党群关系空前和谐,党的执政基础空前巩固。当然,后续的工作还有很多也很繁重,正如习总书记所明确要求的,脱贫不脱钩,继续干。我对贵州省委宣传部部长卢雍政同志感叹说:“为了扶贫,各地政府都不惜血本,投入太大了!”他说:“共产党努力发展经济,政府口袋里有了钱,就是为老百姓花的嘛!”极朴实的一句话,却道出了真理。

这就是当今中国,这就是中国的温度。来自党和政府的关怀,正如暖流涌向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农户。当一个作家走进生活和人民,面对平凡英雄所创造的令人感动的成就,他的心跳一定是强劲的,他的血液一定是炽热的。所以,我希望自己总在路上。

关于当下文学新人的创造

□孟繁华

青年还只存在于作家创作的文本里,存在于青年批评家的话语阐释中,他们还没有走进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的心中,还没有形成普遍的认知。这个时候,可能有两个问题需要我们讨论:一是传统的,过去的,具有共名性或具有社会历史价值的青年形象,我们如何去创造;二是如何评价当下已经创作出的青年人物形象。要说清楚两个问题,我想还是要先回到过去的经验。有人认为讨论现在可以不必讨论传统,他们认为讨论现实如果联系传统,是既安全又有成就感的。于是他们借用或杜撰了莫名其妙的所谓“新词”或新概念。其实,他们对借用概念学科的知识连皮毛都够不上。这并不新鲜的故伎重演,自以为得意却未必高明。他们既对文学现场一无所知,又对传统深恶痛绝,毫不掩饰地用虚无主义的情感态度对待传统,我们当然不能接受。

70年的文学已经成为我们传统的一部分,关于新人的创造,也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比如十七年中的“青春写作”。1956年9月,《人民文学》发表了王蒙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这是一篇充满青春气息的小说,主人公林震是以年轻人单纯、理想和浪漫的情怀走进“组织部”的。他曾尊敬的上级和同事对工作人生的态度,却是以他不能接受的方式出现的,在他狐疑不解的目光中,刘世吾冷漠又

消极,遇事得过且过;韩新世故而虚浮却得到重用;王清泉是典型的新官僚主义却被容忍;“组织部”处理日常工作的效率极低,而且是形式主义的。这些问题使一个年轻人的内心充满焦虑不安,但他没有能力改变这一切。这些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的问题,从一个方面透露了社会已经出现的危机。年轻人浪漫的想法和生活中的一切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另一篇是宗璞的“爱情小说”《红豆》。小说用追忆的方式叙述了女大学生江玫和学物理的男青年齐虹的爱情故事,小说写得缠绵缜密,语言带有知识分子的鲜明特点,特别是对江玫心理活动的细致描摹,在当时说来别具一格。故事讲述了爱情与革命冲突,已经成为“党的工作者”的江玫在回顾个人情感历程的时候,想要表现的是个人情感与历史进程的一致性,在革命尚未成功的年代,她理智地选择了革命道路而放弃了个人爱情。这与“革命加恋爱”的小说模式并不相同,《红豆》表现的是在两者出现矛盾的时候,革命青年应该坚持正确的政治道路而放弃个人情感。因此,江玫是带着检讨和反省的姿态回忆自己的情感的。但有趣的是,这一主观愿望在小说中并没有彻底实现。对爱情如诗如画和缠绵悱恻的动情追述,甚至使叙述者忘记了检讨与反省的最初动因。当年,一些

青年大学生读过小说之后,甚至到颐和园寻找江玫与齐虹定情的确切地点,从一个侧面表达了《红豆》对爱情描写的感人成功。因此,对江玫爱情的同情与批判的立场发生了裂痕。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和《红豆》未必是当代文学的经典作品,但它们是那个时代有难度的作品。这个难度就在于,王蒙和宗璞作为那个时代的作家,他们真诚地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跟上时代的潮流,真诚地表达自己对新时代的拥抱和追随;另一方面,他们也真诚地用现实主义的方法表达他们对文学与生活的理解。他们希望能够处理好这两种关系。也正因为如此,那个时代的王蒙和宗璞是让人感动的。之所以让人感动,就是因为他们诚恳地写出了个人内心真实的纠结、矛盾和困惑。那个时代的作家的可爱,也是值得我们怀念的。无论是王蒙笔下林震的“少不更事”,宗璞对爱情的一往情深,也包括柳青试图建构社会主义文化空间的努力,浩然试图描绘社会主义“艳阳天”的冲动。就他们创作的心态来说,他们做到了与生活建立起真诚关系。

因此,我们在当下要塑造文学新人,创作出新时代的新人,也要坚持一些不变的东西,这个不变的东西就是面对生活的诚恳和诚实。



关于新时代文学新人的创造,我的理解是,这个“新人物”,不是文学史画廊中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也不是美学意义上的“新人”,而是那些能够表达时代要求、与时代构成同构关系的新的人物形象。这种新的文学人物形象的稀缺,曾给我们带来巨大的焦虑。这一判断,显然是基于我们文学史的经验,或者说,从20世纪初期开始,新人的形象就是青春的形象,这些形象已经成为我们世纪之梦的表意符号。他们是负有启蒙使命的青年,是狂飙突进时期的青年,是实行民族全员动员的青年,是建构社会主义文化空间的青年,是挣扎着坚决迈向现代的青年等等。这些青年形象是文学人物,同时也是不同时代社会历史的表意符号。但是,自新世纪以来,我们的文学可能还没有创作出这样具有与时代“共名”意义的青年文学形象。这就是社会生活的巨变、不确定性带来的文学新人,特别是青年形象的创作发生结构性变化的现实。当然,当下也创造了大量的青年形象,但是,这些

今天中国的广袤乡村正在发生着亘古未有的巨变,这种变化无论从历史维度还是全球视野来看都是深刻的。作为一个以农耕文明主导的古老国度,解决老百姓的衣食住行问题一直是执政者的执政理念。正所谓“夫施与贫困者,此世之所谓仁义”也。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消灭贫穷只是一个梦想。这个梦想正在逐步实现。中国的贫困人口从2012年年底的9899万人减到2019年年底的551万人,贫困发生率由10.2%降至0.6%。从减贫数量上看,中国是世界上减贫人口最多的国家。改革开放40年间,中国共减少贫困人口8.5亿多人,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70%,创造了世界减贫史上的“中国奇迹”。在2017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会期间,时任世界银行行长的金镛曾讲,过去五年中国减贫的成就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也是脱贫攻坚任务迎来“最后一公里”的决胜时刻。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这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将是一次。

这就是每天发生在乡土中国的变化,构成无比壮阔的时代图景,微雕着每个个体幽微的精神轨迹。“今日之中国,当造今日之文学。”现实生活需要在文学世界中找到投影,文学也需要从现实生活中建立精神镜像。新时代乡村题材的文学书写,脱贫攻坚应成为浓墨重彩的主题,而创造寄寓时代精神、社会理想又符合发展逻辑,同时还能与作家的审美理想相契合的时代新人形象,更是题中应有之义。

文学的时代新人形象,构成了一个时代生动而多彩的文学长廊。与历史记叙的骨感不同,文学的

时代新人像毛细血管一样,在历史框架之外,以一种沉潜的方式,丰富着人们的记忆,修正着对历史的误读。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代代作家在乡村题材书写中,为文学史奉献出一大批至今仍留在读者记忆中的时代新人形象:《三里湾》中的青年干部王金生、《创业史》中的梁生宝、《山乡巨变》中的刘雨生、《艳阳天》中的萧长春、《李双双》和《陈奂生上城》中的同名人《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安与孙少平、网络小说《大江大河》中的雷东宝与宋运辉、《经山海》中的吴小蒿、《海边春秋》中的刘书雷等等,尽管这些时代新人有着时代的局限,但往往就是因为这些鲜明的时代烙印,这些新人为其时代所独有,成为时代精神的代言人,在文学史中获得较高的辨识度;也正是这些时代新人,永远行走在文学长廊中,在后来者回望陌生的历史区间时提供了鲜活的样本。

乡村题材有着史诗写作和诗性抒情的传统,但今天的作家面临着一个更加复杂、更加庞大、更加变动不居的书写对象。在工业时代的洪流中,乡村与城市的边界日渐模糊,价值观念更趋多元,经济形式的多样化,互联网对日常生活和情感沟通方式的重构,尤其是数字化和人工智能对社会和个体生活节奏的提速,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人的不同诉求和精神迷思等等,包括写作者在内,几乎所有人都被裹挟其中,写作容易成为一种盲人摸象般的自我臆测的文字游戏。如何找到自己位置,如何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的眼光来审视面前这汹涌的洪流,如何理解人的困境和选择,如何呼应时代前进的要求,如何从芜杂的时代背景中提炼具有清晰向度的新人形象,今天的写作者还有很多的功课要做。

要从博大芜杂的时代背景中抠出栩栩如生的

时代新人形象,就像从一块巨大的大理石中雕刻出立体可感的浮雕,这是一项无比艰巨的艺术创造。我们写作者应该有辽阔的胸襟和艺术抱负,清代沈德潜有言:“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才有第一等真诗。”只有“第一等襟抱”和“第一等学识”,才可能具备高远的艺术起点和开阔的视野,才可能如驭风而行一样徜徉在文学的世界。正身先正心,只有用心、用力、用情为民族写史、为时代立传、为人民放歌,我们笔下的作品才会有汨汨清流,源远流长。

怀着一颗初心,我们就能够身体力行,去亲近泥土,感受人间烟火,体验喜怒哀乐。脱贫攻坚战,如果不亲临第一线,怎么知道什么是老百姓真正的“贫”,什么是真正的“苦”?报告文学《古路之殇》写的是四川雅安古路村,四川数以百计的“悬崖村”中的一个,这是一个“以声音命名的村庄”。“咕噜”,“一块石头从山上掉下去了‘咕噜,咕噜’”,从山上滚下去,“并没有听到几声‘咕噜’,一个人就不在了”。寥寥几笔,古路村村民生存环境之艰险跃然纸上,这是在电脑前的我们很难体会的。

有了雄心,有了体验,最终决定作品艺术高度的还是笔力。这需要创作者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揣摩、练习,最终从一大堆素材中找到最合适的那部分,作家要成为时代新人的“美容师”。

为什么我们今天一再、再而三地提到柳青,提到路遥?那是因为他们以达徒般的自律和文学苦修,达到了一般人远远达不到的艺术高度。他们已经成为文学世界的标高,超越这个高度,是今后后浪作家的使命。脱贫攻坚,这个巨大的写作场域,容得下无数浪花的欢腾,最终,它们构成一个伟大时代的壮阔图景,为一个时代留下永恒难忘的文学记忆。



为时代留下永恒记忆

□邓凯

前,消灭贫穷只是一个梦想。这个梦想正在逐步实现。中国的贫困人口从2012年年底的9899万人减到2019年年底的551万人,贫困发生率由10.2%降至0.6%。从减贫数量上看,中国是世界上减贫人口最多的国家。改革开放40年间,中国共减少贫困人口8.5亿多人,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70%,创造了世界减贫史上的“中国奇迹”。在2017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会期间,时任世界银行行长的金镛曾讲,过去五年中国减贫的成就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也是脱贫攻坚任务迎来“最后一公里”的决胜时刻。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这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将是一次。

这就是每天发生在乡土中国的变化,构成无比壮阔的时代图景,微雕着每个个体幽微的精神轨迹。“今日之中国,当造今日之文学。”现实生活需要在文学世界中找到投影,文学也需要从现实生活中建立精神镜像。新时代乡村题材的文学书写,脱贫攻坚应成为浓墨重彩的主题,而创造寄寓时代精神、社会理想又符合发展逻辑,同时还能与作家的审美理想相契合的时代新人形象,更是题中应有之义。

文学的时代新人形象,构成了一个时代生动而多彩的文学长廊。与历史记叙的骨感不同,文学的